

## “文革”中的鲁迅

葛涛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鲁迅对“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和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鲁迅不仅在政治层面极大地影响到“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且也在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深远地影响了“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

关键词：文革、鲁迅、官方、民间、影响

“文革”初期，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反击苏联借纪念鲁迅来攻击中国“文革”的言论，而举行了有七万多人参加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会，把鲁迅塑造成毛泽东的红小兵，号召红卫兵学习鲁迅的造反精神，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仅极大地歪曲了鲁迅的真实形象，而且也开始把鲁迅纳入“文革”的话语体系之中，利用鲁迅为“文革”服务。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判《水浒》运动中又利用鲁迅来为这些运动服务，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出了“读点鲁迅”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鲁迅的高潮，极大地推动了鲁迅在全国各地的普及工作。在中国歪曲与利用鲁迅达到巅峰的“文革”时期，国外的鲁迅研究却陆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极大的弥补了中国国内鲁迅研究的缺陷。

### 鲁迅与“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1966--1976）

#### 1, 鲁迅与“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

##### ①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

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形势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已经破裂；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朝鲜战争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1966年5月，毛泽东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苏联的一些官方媒体和汉学家在10月份借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机会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批评。10月19日，上海、广州、绍兴等地隆重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会，但是这些大会都没有来得及对

苏联的批评作出反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在10月31日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会来反击苏联的批判。

从新华社的报导中提到的出席大会的人员和人数可以看出这次会议之隆重：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国家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及第三世界热爱中国的友好人士，这不仅充分表明了这次会议的广泛代表性和重要性，而且充分表明红卫兵已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七万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纪念鲁迅的活动，这极大地展示了中央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信心和力量。

姚文元代表中央作了题为《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的讲话，对苏联利用鲁迅来批评“文革”的言论进行了批驳：

最近，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竟利用纪念鲁迅的机会，无耻地用诬蔑鲁迅来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竟然把鲁迅诬蔑成什麼“人道主义者”“博爱的歌手”。他们胡说什麼鲁迅主张旧时代的文学和艺术有“永久的价值”，鲁迅反对文化领域中进行革命，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真是对鲁迅极其卑鄙的捏造。

姚文元最後向红卫兵发出了号召：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历史面前，鲁迅那种永远前进、革命到底的精神，更觉得珍贵。我们一定要像鲁迅那样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跟上不断发展的形势，永远跟著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闹革命，永远同革命的人民在一起，努力学习新事物，热情支持新事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永远前进，革命到底，永不中途退却！永不掉队！永远忠於毛主席，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和好战士！

从姚文元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次纪念鲁迅的大会重点是以纪念鲁迅的名义来动员广大人民特别是红卫兵的力量，反击苏联的批判，永远忠於毛主席，坚定不移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来学习鲁迅、纪念鲁迅。

大学生红卫兵代表、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黄平稳和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北京长征中学学生刘路分别作了题为《学习鲁迅，永远忠於毛主席》和题为《斥西蒙诺夫》的发言，许广平和郭沫若代表鲁迅家属和文化界分别作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著鲁迅》和

《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讲话。从红卫兵和许广平、郭沫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按照姚文元的讲话精神来演讲，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式对鲁迅的语言进行了新的阐发，利用鲁迅为“文革”服务，从而把鲁迅与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文革”紧密结合起来，把鲁迅纳入“文革”的话语体系之中。黄平在结合红卫兵的实际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之后，代表大学生红卫兵宣誓要“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许广平在讲话中强调了鲁迅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热爱，称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的太阳”；郭沫若在讲话中也突出了鲁迅对毛主席的热爱，认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鲁迅临死前的入党申请书，而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此外，刘路、许广平、郭沫若都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在讲话中批驳了苏联的一些学者对“文革”的批评。

可以说，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姚文元、郭沫若等人的讲话，鲁迅不仅成了红卫兵造反的榜样，而且成为毛主席的忠实的一个小兵，并成为中苏论战的工具，因此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纪念鲁迅的大会同时也是对鲁迅歪曲、利用最严重的大会，深刻的影响了“文革”中广大红卫兵对鲁迅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导致“文革”中政治利用鲁迅现象的普遍化、极致化。

## ②《人民日报》刊登的纪念鲁迅的文章

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而发表了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社论重点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纪念鲁迅，“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社论指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极端仇视。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甚至无耻地以‘纪念’鲁迅的幌子，吵吵嚷嚷，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和旧文化的维护者，藉以攻击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身上，要想找到攻击我国文化革命的任何藉口，都是枉费心机的。”社论最后发出号召：“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不倦的追求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彻底地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

这样社论就把鲁迅塑造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造反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仅鼓励红卫兵以鲁迅为榜样大胆的造反，“痛打落水狗”，而且鼓励红卫兵要像鲁迅那样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

197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为纪念鲁迅诞辰九十周年而发表了上海市委写作组用“罗思鼎”的笔名撰写的《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纪念鲁迅诞辰九十周年》一文，这篇文章结合当时的批孔运动，强调学习鲁迅彻底批判孔家店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纪念鲁迅，要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深入搞好斗、批、改的需要。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革命大批判一刻也不能停顿，还要努力作战。我们要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前进！”

这篇文章把鲁迅塑造成革命大批判的战士，突出了鲁迅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以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来表明当前批孔运动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197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而发表了题为《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的社论。社论首先指出：“鲁迅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永远进击’的一生。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实践，突出的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革命的特征和品质”。社论最后发出了号召：“革命无止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在斗争中前进的。鲁迅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我们去战斗。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反对任何违背党的三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在国家领导人交替的关键时期，发表了纪念鲁迅的社论，无疑是用鲁迅的“永远进击”的精神来号召全国人民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新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的领导下，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革命，“永远进击”。

### ③鲁迅著作注释与出版工作引起的政治斗争

鲁迅著作的出版也牵动了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红旗》杂志还以编辑部的名义添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组利益的宗派主义。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同日，《人民日报》以“《红旗》杂志为纪念党的生日 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辑部为此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按语 并发表文章揭露批判周扬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电讯。7月4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红旗》发表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一文，把批判周扬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一场由鲁迅注释引发的政治斗争逐渐被扩大化，不仅造成了许多人间惨剧，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以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较长的时期，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特别是鲁迅的这一条注释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论。

## (2) 鲁迅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

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对鲁迅的大力宣传也促使一些国外的官方的研究机构或学者关注鲁迅，这极大地促进了国外翻译鲁迅、研究鲁迅的工作，一些左翼学者还以革命的热情大力宣传、介绍鲁迅。“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也受到国外纪念鲁迅活动的影响：中、苏之间因为纪念鲁迅而发生了论战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中、日之间通过纪念鲁迅促进了中日关系。

### ① 中、苏围绕纪念鲁迅所进行的关于“文革”的论战

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极大的推动了苏联的鲁迅研究工作，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随著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的鲁迅研究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鲁迅研究一度还成为中苏之间政治论战的工具。

1966年10月8日，苏联《文学报》刊登了康·西蒙诺夫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而撰写

的《想念鲁迅（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一文，在介绍了苏联出版鲁迅著作的情况以后，西蒙诺夫对中国“文革”利用鲁迅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对此不能不高兴，因为我们，苏联的文化工作者，深深地相信，目前在中国进行的称之为‘文化革命’的一切，是和人民格格不入的暂时的现象，而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和文学的联合是巩固的、非暂时的、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鲁迅的伟大名字，在传到我们耳中后，随著所谓‘文化革命’（实际上同革命和文化都毫无共同之处）而来的那种粗暴的不体面的反复叫嚣的背景上，将发生更加响亮和经常不断的声音来。”西蒙诺夫的这篇文章在中国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被斥为是苏联修正主义利用鲁迅来反对中国的“文革”。

10月18日，《苏维埃文化报》发表了符·伊·谢曼诺夫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而撰写的《思想家——文学家（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一文，指出了鲁迅的思想特点和文学成就：“鲁迅在自己身上把人道主义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同时也是另一种结合的光辉范例——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谢曼诺夫最后指出了鲁迅在文学上的贡献：“杰出的作家、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鲁迅第一个使中国文学登上了世界舞台，使它和欧洲文学接近起来，同时成为卓越的真正有民族特点的艺术家的，因此获得了地球上一切思想进步的人们的敬爱。”

1971年，艾德林在为纪念鲁迅诞生九十周年撰写的《真理的捍卫者——关于鲁迅》一文中指出：“鲁迅的人道主义的遗产，就是在今天，也像作家在世时一样，是对损害进步、损害光明、损害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文化的人们的批判。”

这几篇文章都是针对中国“文革”时期对鲁迅的评价，通过强调鲁迅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来含蓄的批评中国的“文革”对鲁迅的歪曲。

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公开点名反华，并要同中共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此后，苏联报刊上掀起了反华的高潮，苏联的一些中国学家和鲁迅研究家也以纪念鲁迅，研究和评论鲁迅为名来反华，明确批评了中国的“文革”，并指出了中国在“文革”中歪曲鲁迅的政治目的。

谢曼诺夫在《鲁迅与教条主义》（《亚非人民》杂志1968年第2期）一文中批评了中国领导人的文化政策，指出：“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不仅对世界古典文学，而且对几乎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整个文学，都加以闻所未闻的咒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家，在今天的中国得到承认的，事实上只有鲁迅一人。对于鲁迅，他们宁可歪曲而不打倒的。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未必是鲁迅的天才，因为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对任何天才都

不予理睬的。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是：鲁迅是民族新文化的始祖（要知道民族新文化是不能一点不留下的），而且是在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二年得到毛主席赞扬的。”

阿·尼·热洛霍夫采夫在《伪造在继续——读中国报刊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远东杂志》1973年第2期）一文中详细地批评了中国“文革”对鲁迅的歪曲：“鲁迅所表现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忠诚，现在中国变成了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忠诚”，这“距离”鲁迅同毛主席的“真正关系太远了”。在三十年代“根本谈不上什么特殊的‘毛的路线’”，鲁迅生前“听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毛泽东思想’”，当时“甚至还没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术语”，“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直到四十年代才宣布的”。而鲁迅在后期是“从进化论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转向毛泽东思想”，鲁迅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的”。热洛霍夫采夫在《中国“文化革命”以后鲁迅遗产的命运》（《中国文学研究在苏联》论文集，1973年8月出版）中指出：“文革”“特别强调‘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把鲁迅当作是在人民中间鼓吹所谓‘阶级斗争’的手段之一”，在中国“关于鲁迅的论文中，还清晰的表现出了九大制定的对内政组织路线的基本倾向：深入和扩大所谓‘阶级斗争’（即反对刘少奇和其他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中国“当前的方针”是与“鲁迅的创作精神”“大相径庭”的，中国“利用鲁迅的威信适应‘文化革命’的需要和要求”，“文化革命的实质同这位元伟大作家的革命目标是根本对立的。”[84]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苏联鲁迅研究专家在六、七十年代撰写的这些关于鲁迅的文章虽然更多的是从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出发而写的，借鲁迅来批评中国的“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对中国“文革”对鲁迅歪曲的一种反驳，对于促使中国的鲁迅研究在“文革”后走上正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苏联学者对于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强调也是鲁迅研究的重要进展，对后来的鲁迅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②中、日围绕纪念鲁迅所进行的外交活动

1972年，中、日建交有力的推动了日本纪念与研究鲁迅的活动，日本各地不仅相继举行了一些纪念鲁迅的活动，并开始以鲁迅为象征来推动日中友好，而且日本的鲁迅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197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日本各地陆续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这些活动都突出了鲁迅是日中友好的先驱的主题。据新华社1976年11月6日电讯报导，“在广大日本人民的心目中，鲁迅也是一位救国救民的伟大战士，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这在日本各

地举行的许多纪念活动中，都表现出来。鲁迅还被广大日本人民和研究界认为是日中友好的先驱，与藤野先生一起被尊为架设日中友好之桥的先贤，这在日本历次举行的有关纪念活动中，在建立的各种有关鲁迅的纪念碑中，都有极为生动的表现”。在京都“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实行委员会”散发的传单写道：“鲁迅是日中友好的先驱”。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我们必须明确鲁迅的文学和鲁迅的革命精神在今天的意义，把它真正的应用於日本的实践。”[85]

### 鲁迅与“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

#### 1、各种与鲁迅有关的著作的出版

##### ①形形色色的《鲁迅语录》

“文革”中出版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鲁迅语录》，其中又有相当多的是按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式样印刷的，这无疑显示出《鲁迅语录》具有和《毛主席语录》相似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鲁迅语录》虽然有许多种类，但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从鲁迅的部分杂文和部分书信中摘取的一些段落或一些句子编成的，在内容方面也有高度的相似性。

因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与高度评价，“文革”中出现了一些以“鲁迅”为名的红卫兵组织，如各地的“鲁迅兵团”、“鲁迅战斗队”、“鲁迅纵队”等，这些为弘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而建立的以“鲁迅”为名的红卫兵组织也编辑了一些《鲁迅语录》，从这些语录中可以看出“文革”中鲁迅语录的出版状况。

署名为“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内蒙古宣教口鲁迅兵团翻印”的《鲁迅语录》在1967年11月出版，署名为“北京师范学院《鲁迅兵》、北京鲁迅博物馆《红色造反派》、北京电车无轨一厂《烈火》编辑部”编辑的《鲁迅语录》在1968年1月出版，署名为“哈尔滨第四中学鲁迅兵团”编辑的《鲁迅语录》在1968年出版。从这三本《鲁迅语录》的编辑体例中可以看出，编者都把毛泽东放在最突出的地位，不仅在扉页刊登了毛主席语录，而且还刊登了毛泽东论述鲁迅的大量的言论，有的还刊登了毛泽东的照片。这样就把鲁迅和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鲁迅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之内。

另外，这三本语录的编辑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清算“周扬等一小

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鲁迅进行的恶毒的政治迫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编辑的各种《鲁迅语录》无疑极大地促进了鲁迅思想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青少年，但是这些从鲁迅文章中摘录的一些语句在被编成各种《鲁迅语录》，并被红卫兵用于批判和斗争时，基本上都是歪曲甚至背离了鲁迅原意的，对于鲁迅的传播无疑也产生了深远的、很难消除的不良影响。

### ②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重版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周恩来总理准备送给他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为此总理办公室曾多次派人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书，但是在当时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已被认作是“禁书”，要送就只能送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没有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的纪念本，最后从鲁迅博物馆馆藏的两套纪念本中才选出较好的一套送给尼克森。此事使人民文学出版社想到了重版1938年版《鲁迅全集》。可以说，尼克森访华不仅打开了中美交流的大门，而且也直接促进了重新出版鲁迅著作的工作。12月，由姚文元请示周总理后，周总理批示同意出版。1973年初，经过孙用仔细校勘并改正了原版的一些编校错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简体字的方式重印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并作两处重要的改动：一是删去了蔡元培原序中的落款“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二是在第四卷《伪自由书·王道诗话》的文后增加了一条新注，“说明”当时已经被打为叛徒的瞿秋白写的这12篇杂文是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撰写的，不仅“包括了鲁迅的某些观点”，而且“经过鲁迅的修改”，因此才收入全集。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经过孙用校勘的二十四种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各地的出版社也租用人文社的纸型翻印这些鲁迅著作，这不仅极大的促进了鲁迅著作的传播，而且极大地满足了当时无书可读的读者的阅读需求。

### ③《鲁迅批孔反儒文辑》、《鲁迅批孔作品选读》和《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等书籍的出版

1973年和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先后编印了《鲁迅批孔反儒文辑》、《鲁迅批孔作品选读》、《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各一册，其中的《鲁迅批孔作品选读》只印了试印本，未正式发行。此外，各地的出版社结合批林批孔运动、批《水浒》运动也相继出版了一些类似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选择鲁迅的几篇

文章，然後结合现实的政治运动进行阐释，歪曲利用鲁迅的文章，通过鲁迅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鲁迅批孔反儒文辑》选录了《我之节烈观》、《十四年的“读经”》、《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礼》、《谈皇帝》、《儒术》等文章，编者在《编选说明》中指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他的许多文章，深刻的剖析了孔子学说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揭露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给儒家思想以有力的批判和打击。学习鲁迅的这些文章，对于当前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有重大的意义。”

#### ④《鲁迅日记》和新版《鲁迅书信集》的出版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在胡乔木的支持下就鲁迅著作出版工作和鲁迅研究工作上书毛泽东，11月1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要求政治局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1976年4月，国家出版局主持在济南召开了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并讨论了毛主席关于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批示和周海婴的信，并对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要求和注释体例等重新又做了一些讨论，同时也明确要求各注释组所在地的党委宣传部门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这次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

但是，新版《鲁迅书信集》出现了一些“政治问题”：“出版说明”中没有提到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没有点刘少奇、周扬的名；没有说明为什么把鲁迅给好人和坏人的信都收了等。为此，出版局要求人文社改写“出版说明”，并通知书店立即停售和收回未售出部分，工厂尚未送出的则存厂停送。人文社只好按照出版局的要求一面改装一面发行，10月末，就出版了修订版的《鲁迅书信集》。这次《鲁迅书信集》引发的政治风波充分显示出政治因素对于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重要影响。

#### ④石一歌编撰的有关鲁迅的著作

1971年秋，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上海时专门对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作出了指示，他说：“文科教材不能光是毛主席的诗文，对此主席本人也不会同意。也不能用太多的政治档当作文科教材。我希望先用鲁迅先生的作品作为文科教材，以后再逐渐扩充其他内容。上海在这个问题上要带个头，因为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了十

年之久嘛。可以先成立鲁迅教材编写组，也要向工农兵学员讲清楚鲁迅生平，以及他与那些反动势力的斗争。大学的文科复课，比理工科艰难，大家要一步步试验。”11月29日，张春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这样不仅可以为今后撰写为江青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打下基础，而且也可以向上级交差。经过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朱永嘉在1972年1月3日正式组建了“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因为编写组共有11人，所以起了一个“石一歌”的笔名（谐音为“11个”）。这个教材编写组在最初的工作地点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工作期间，陆续编出了《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等教材，署名均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这些教材立即用到了课堂上。1972年，编写组撰写了10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写作组负责人肖木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深度不如姚文元。张听後没有表示意见。1973年，《朝霞》丛刊第1期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後，姚文元说：“这样写还可以，就怕浅了”。另外，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还用“石一歌”的笔名编写过一本少儿读物《鲁迅的故事》。

1974年，这个教材编写组搬迁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改变了编写教材的职能，并更名为“石一歌”小组，任务仍然是写《鲁迅传》。《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人当作了敌人。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四人帮”党羽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後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作了大改後以《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为题提前发表出来。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引用鲁迅的原话，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在《鲁迅传》最後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进行诬陷和批判。[80]

#### ⑤以鲁迅为名的出版物

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组织还创办了一些以鲁迅为名的出版物，这些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出版物主要刊登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和这些组织的活动情况，主要用於交流和传播资讯。笔者在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鲁迅文艺战

团主办的《鲁迅文艺战报》、舟山报社鲁迅战斗团主办的《鲁迅战报》和鲁迅大学造反派主办的《鲁迅战报》。笔者看到的这一期《鲁迅文艺战报》刊登了《向无产阶级文艺战线的伟大旗手江青致敬——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大事记》和用毛泽东《七律·为李进同志所摄的庐山仙人洞照》谱写的歌曲；舟山报社鲁迅战斗团主办的这一期的《鲁迅战报》（活页文选2）刊登了1967年10月22日《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李天佑等首长接见安徽赴京汇报代表团全体同志的讲话纪要》；鲁迅大学造反派主办的这一期《鲁迅战报》刊登了《紧紧掌握战斗的方向》和《四月十六日江青、陈伯达、康生讲话要点》等文章。另外，一些以鲁迅为名的造反组织也主办了一些出版物，这些出版物虽然没有以鲁迅的名字来命名，但是也经常刊登鲁迅语录和鲁迅的文章。

#### 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

“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的教材被停止使用，但是各省市都自编了本地区使用的教材，其中选录的鲁迅作品和“文革”前选录的鲁迅作品大多相同，只是随著“文革”的进展又增添了一些鲁迅文章：“在‘批孔’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被选入教材；评《水浒》时，《流氓的变迁》被选入教材；为了证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为必读篇目；1976年10月以后，因批判张春桥的需要，《三月的租界》也被选入教材”。

此外，“文革”期间中学语文课本对鲁迅及其著作进行了歪曲和利用，把鲁迅塑造成毛主席的学生，把鲁迅的作品塑造成“革命大批判的武器”：“《一件小事》用来证明知识份子应该向工农学习，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狠斗私字一闪念’；《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用来证明知识份子与工农结合道路的必要性；《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斗争形形色色‘阶级敌人’的最有力的武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和《文学与出汗》是批判‘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教材；《风波》诠释的是‘文革’最响亮的口号‘反复辟、反倒退’；《故乡》和《祝福》因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逻辑地证明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友邦惊诧论》是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81]

“文革”期间中学语文课本对鲁迅作品的选录与阐释虽然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对鲁迅进行了利用，造成了深远的恶劣的影响，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鲁迅的传播。

#### ⑦发行纪念鲁迅的邮票

1966年12月31日，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邮电部结合“文革”的形势发行了《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的邮票，全套三枚，图案分别是“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鲁迅像”、“鲁迅手稿”，编号为纪122，前两枚邮票的设计者是刘硕仁、孙明春，第三枚邮票的设计这是孔绍惠，每个邮票都印刷了600万枚。这套邮票重点突出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精神，不仅将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一段话作为这套邮票中的第一幅邮票，而且也结合“文革”中的革命形势为这套邮票设计了红色的背景。

1976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邮电部发行了《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邮票，全套三枚，图案分别是“鲁迅浮雕像”、“永不休战”和“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编号为J.11。这三枚邮票分别采用了美术家张松鹤、汤小铭、沈尧伊的雕塑和油画进行设计，设计者为刘硕仁、邓锡清，每个邮票都印刷了1000万枚。这套邮票虽然是在“文革”结束3天后发行，但仍然属于“文革”期间设计、审批的邮票。因为“文革”后期设计、审批了11套“J”字头纪念邮票(J.1至J.11)，其中前10套在“文革”期间发行，这一套在“文革”结束（1976年10月16日）之后3天才发行。

这套邮票也紧密配合“文革”政治形势设计，例如第二枚邮票采用汤小铭《永不休战》的油画进行设计，画面上的鲁迅，头部昂扬向上，两眼蕴含着悲愤，手中握著笔，正在构思，体现出鲁迅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永不休战的顽强战斗精神。

#### ⑧重建绍兴鲁迅纪念馆

“文革”中，绍兴市对原来的鲁迅纪念馆进行扩建，在鲁迅故居的旁边仿照杭州等地的“红太阳”展览馆建造了一座具有鲜明“文革”样式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用阔大飞扬的“文革”式建筑风格体现了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这一象征含义。

### 鲁迅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影响

#### ①全国学习鲁迅著作的高潮

1975年末，毛泽东发出了“读点鲁迅”的号召，由此掀起了全民学习鲁迅著作的高潮。197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和通讯员采写的鲁迅故乡人民学习鲁迅著作的报导《战斗正未有穷期——访鲁迅故乡绍兴》。

这篇报导详细地描述了鲁迅故乡的人们结合政治形势学习鲁迅的先进事迹，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故乡的人们把学习鲁迅与当前的生产与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巧妙地寻找到鲁迅和当前的政策的结合点，把学习鲁迅纳入到毛泽东的路线之中，“决心运用（鲁迅的）这些经验，指导当前的斗争，搞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战斗的实际行动纪念鲁迅。”另一方面，从这篇报导中也可以看出由毛泽东掀起的学习鲁迅的热潮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运动虽然有实用主义的利用鲁迅的倾向，但仍然极大地促进了鲁迅的传播，使鲁迅的影响迅速地传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 ②鲁迅作品在民间的流传

“文革”时期，鲁迅的著作是在毛主席的著作之外唯一被官方允许阅读的文学作品，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鲁迅的著作成为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并对“文革”时期的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家张抗抗毕业于鲁迅曾经任教过的中学，并在中学期间参加了“鲁迅文学兴趣小组”，她在《心灵的哺育者——鲁迅》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在“文革”时期阅读鲁迅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我去了北大荒农场。在我能带走得不多的书籍中，鲁迅先生的作品占了几乎一半。在那周围没有更多的书籍、也不允许阅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的火炉边，鲁迅先生是一位幸存者，在身边陪伴我们度过了那麽艰难的岁月。……在那个年代中，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精神力量。从这时候开始，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个反抗黑暗势力、寻求光明的勇士的形象，在我的心里牢牢扎根了。一种由衷的敬仰和热爱，代替了幼时带有盲目性的神圣感和崇拜心理。

作家张扬从10岁开始看鲁迅著作，鲁迅的思想、人格和作品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他的“奶”和“血”养育了我的“肉”和“骨”》一文中，他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阅读鲁迅著作的情况：

作为“文革”时期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甚广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还特别回忆了自己在“文革”时期创作这篇小说的经过及由此遭受到的磨难：

我应当永远感激伟大的鲁迅。他的硬骨头精神，极大地激励了铁窗岁月中的我。“立足於死、背水一战”的结果，是使我有勇气揭露并怒斥“四人帮”一夥在办案中的大量违法乱纪行为。使他们狼狈不堪、深陷被动，被迫中断预审达一年之久，从而使我自己争取了时间。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当他们操起刀笔，重新开手办案时，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成批杀人的血腥计画终於被制止，我终於博得了第二次生命！（以後的材料证实：毛主席逝世後，张春桥制定了一个“杀人”计画，而在湖南“内定”第一批处决的五十二人中，我被列为“首恶”。）

鲁迅不仅对那些在“文革”中热爱他的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又通过这些青年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著作的艺术改编和鲁迅艺术形象的塑造在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达到高峰，不仅出现了多部由鲁迅著作改编或表现鲁迅的电影和剧码，而且也出现了众多的美术作品。八十年代涌现出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深受鲁迅的影响，作家刘恒曾说自己的创作有著鲁迅的影子，他最满意的中篇小说《虚证》可以说是鲁迅的《孤独者》的翻版。画家裘沙在“文革”中经历了许多磨难，目睹了众多的“阿Q相”和社会阴暗面，由此萌发了创作阿Q美术作品的念头。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和美术、电影、舞蹈、戏剧等艺术都是借著中共中央高调纪念鲁迅之风而在“文革”之後复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指出“鲁迅第二次挽救了中国文化”，“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张抗抗在成为作家之後说：“我觉得，後来在我成年後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维护人的尊严的强烈愿望、对弱者的同情、对正义的渴求，以及自己对精神和个性压抑的不自觉的反抗的人生态度，是受到我早期熟读的鲁迅先生小说的深刻影响的。……所以，我始终认为，鲁迅先生在思想上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迪，在對於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与文学、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艺术观上所起的作用，要大於他作品的艺术性对我们的陶冶”。作家张扬在八十年代说：“虽然鲁迅的思想、人格和作品对我有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作为作家的我；然而，由於‘辈份’相距甚远，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和接受这一点的。……我的作品特别注重人性的反映和感情的刻画，而且一般都作为悲剧处理，就是受了鲁迅的性格和他那些具有撕肝裂胆之力的悲剧作品的影响。鲁迅著作的影响，还体现在我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和《金箔》中”。[82]

### ③鲁迅著作的艺术改编和鲁迅的艺术形象

鲁迅是中国现代左翼美术的精神导师，“文革”中，有关部门为了宣传鲁迅而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鲁迅的画册和宣传画，极大地促进了鲁迅在民间的传播。“文革”之后，程十发、范曾、裘沙等众多的著名美术家都创作过与鲁迅题材有关的美术作品，掀起了新时期美术复兴的高潮。

#### (1) 组画《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

1974年7月，国务院文化组美术作品征集小组编的《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组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郑毓敏、潘鸿海、顾盼绘，沈欣、钟秀达、马立编文。编者在《前言》中介绍了鲁迅的思想历程并指出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鲁迅的重要现实意义：

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向鲁迅学习。当前，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学习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对于提高广大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个画册的封面是鲁迅像（油画），扉页有红字印刷毛泽东评鲁迅的语录。然后依次是15幅鲁迅形象：1、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2、寻求真理；3、“我以我血荐轩辕”；4、终止学医，从事新文艺；5、上街宣传；6、看到新世纪的曙光；7、忠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8、支持女师大学子的正义斗争；9、在广州中大校务紧急会议上；10、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11、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12、电贺毛主席和党中央；13、痛斥“四条汉子”；14、关怀和培养青年；15、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这15幅图的标题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些美术作品都结合了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等运动，选择了鲁迅生平中能体现出鲁迅革命色彩的事件作为创作的题材，从而以鲁迅的权威性来表明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等运动的合法性和正确性。

《鲁迅》组画出版后受到了好评。1974年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树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喜看组画〈鲁迅〉》一文，这篇文章对《鲁迅》组画作出了高度评价

价，并指出了组画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围绕著对鲁迅的评价、宣传和用艺术作品塑造鲁迅的光辉形象，一直存在著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鲁迅》组画的作者们，正是批判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加深了对伟大的鲁迅的认识，加强了对鲁迅的热爱和表现好鲁迅形象的强烈愿望，又经过反复加工创造，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这篇文章不仅明确指出《鲁迅》（组画）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政治意义，而且指出《鲁迅》（组画）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经验取得的成功，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组画）是贯彻江青的指示，利用鲁迅来进行政治路线斗争的工具。

### (2) 《鲁迅》美术图片集

197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美术图片集《鲁迅》，收录了“文革”期间创作的一些以鲁迅为主人公的美术作品，这些美术作品大多都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广州鲁迅纪念馆。

这些画基本上代表了“文革”期间创作的以鲁迅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特点，不仅重点描绘鲁迅革命性的一面，而且借鉴“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在构图、著色等方面都可以突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其中以汤小铭在1972年创作的油画《永不休战》最有代表性，也最为著名。

1972年，汤小铭应上海鲁迅纪念馆之邀创作了表现晚年的鲁迅在病中坚持写作的油画《永不休战》，标题是为参加全国第二届美术展览而临时加上去的，出自鲁迅去逝前两个多月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一文，此画也因此而成了鲁迅与“四条汉子”作斗争的写照。这幅画充分表现出“文革”美术作品塑造鲁迅的特点，在当年举办的全国第二届美展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举成为当时所有描绘鲁迅的美术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 (3) 鲁迅展览图片

“文革”时期，各地的鲁迅纪念馆都关闭，有关工作人员在闭馆期间制作了一些鲁

迅图片的流动展览到部队、工厂和农村展览。

1974年4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制作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流动展览图片，用89幅图片展示鲁迅战斗的一生，从6月至1975年10月多次到上海的部队、工厂和农村展览。

1976年1月，上海鲁迅纪念馆把赴日展览的《鲁迅生平》展览的内容制作成图片和幻灯片，在上海的工厂、农村和部队进行流动展览。

另外，“四人帮”还利用鲁迅展览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75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鲁迅批林批孔展览，1976年4月，上海鲁迅纪念馆按照上海市政府的指示在上海市青年宫布置了《学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的图片展览，后来又到医院、农村进行流动展览，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

这些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展览图片，大都突出了鲁迅战斗的一面，在当时对于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鲁迅的战斗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3]

#### 4, 结论

“文革”时期是鲁迅文化史上最为独特的时期，不仅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鲁迅语录》，而且也出现了各种以鲁迅为命的红卫兵组织，官方把鲁迅塑造成文化革命的先驱和党的一名小兵，号召红卫兵学习鲁迅的造反精神，像鲁迅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为了反击苏联利用鲁迅来攻击中国文化大革命言论，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有七万多人参加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不仅表明“文革”中歪曲利用鲁迅达到了顶峰，而且也表明鲁迅成为中苏政治论战的工具，极大地影响了普通群众对鲁迅的认识与理解。而有关鲁迅的出版物和美术作品也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把鲁迅的言论运用的政治运动中去，突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形象。

不过在民间，一些青年还通阅读鲁迅作品从精神上走近鲁迅，成为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国外的鲁迅研究，特别是苏联、美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大都对鲁迅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有力地弥补了中国鲁迅研究在“文革”时期的偏至，进一步推动了鲁迅研究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鲁迅不仅在政治层面极大地影响到“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的转

型，而且也在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深远地影响了“文革”之後的中国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检点鲁迅在“文革”前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看出官方一直在政治层面利用鲁迅来达到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目的，同时，一些热爱鲁迅的知识份子在经过各种磨难之後从精神上接近真实的鲁迅，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传承真正的鲁迅精神。官方塑造的鲁迅形象和民间构建的鲁迅形象又一起构成了鲁迅在“文革”时期的复杂形象，官方层面的鲁迅和民间层面的鲁迅不仅存在一定的冲突，而且也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因此，既要关注两者之间的张力，也要关注两者之间的引力。如果没有官方的大力提倡和政治利用，没有经历过生活磨难的知识份子也不大容易接触到真正的鲁迅，从而鲁迅精神也不大容易在民间承传；而没有民间知识份子对鲁迅精神的承传，那麽“文革”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鲁迅形象就会很单调，鲁迅的真实形象就会被遮蔽。从“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史来看，官方层面的鲁迅是官方在社会转型期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工具，鲁迅的形象是被官方扭曲的，不过随著时代的发展，官方已经逐渐抛弃鲁迅；与此同时，民间层面的鲁迅一直是知识份子的精神导师，民间对鲁迅精神的承传也一直绵延不绝，并且随著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鲁迅对於中国的价值和鲁迅精神的重要性，鲁迅依然在民间的层面对中国社会产生著影响。